

● 中国传统文化

# “历史文化语义学”的新进展

尚永亮

(武汉大学文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尚永亮(1956-), 男, 河南长垣人,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摘要] 冯天瑜先生的《新语探源》, 识见敏锐, 新意迭出, 注重概念辨析和论理的研究是其重要特色。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 对关键新词深挖细探, 辨误析疑, 在有关概念的发现和厘定上深造自得, 独辟新境。其二, 深入相关学科, 将概念解析与社会文化态势及传播主潮相结合, 由小见大, 以点带面, 开掘词语的文化内蕴和意义功能。其三, 重视新语构成规律的探索和总结, 将关注目标定格在历史和现实的坐标之上, 体现出建设性的文化关怀。

[关键词] 新语探源; 概念辨析; 论理研究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5)06-0731-03

概念史研究与通常的语言学研究既有重合之处, 又有所不同。准确地说, 概念史的研究与历史语言学的工作相近, 不过它更注重语义在时间传承和空间转换过程中的文化背景分析, 有学者称之为“历史文化语义学”, 大抵得之。冯天瑜先生新著《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中华书局, 2004年版), 便是作者在历史文化语义学领域中的一个新探索。总体看来, 该著作识见敏锐, 大气包举, 颇有新意, 如果仅仅从语言转译史的角度来阅读, 是不够全面的。

冯著将近代新语生成, 置于中西日文化互动的大背景下, 着力考察汉字及汉语文化在近数百年内面对西方话语霸权的因应和嬗变, 考察中西日文化交互关系中汉字新语的生成机制及其相互采借、彼此受容的特点和规律, 将之视为明清及民国文化史的重大课题, 有机地沟通、融会了语言学与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诸大视域, 从而在学术视野、研究层级与理论深度上, 均获得了拓展和升进。而在材料使用上, 著者既广参前贤有关论著, 于文中时时点勘; 又遍览群书, 采铜于矿, 细考覃思, 深造自得。可以说, 重视第一手材料的使用, 是冯著诸多创识的前提和基础。

冯著共6章22节, 其首章论汉字文化的拓展及古代借词, 并对“汉字”、“汉字文化圈”诸关键术语作了准确而有前沿性的概括, 此后5章即围绕“借词西洋三阶段”循序展开, 在全面介绍汉字新语生成史的基础上, 将主要精力投入对关键概念的辨析及其内涵在不同时期演绎嬗变的论说和阐释上。著者一贯认为: 术语厘定, 是学科形成与发展的必要前提。对于一门学科而言, 必须拥有一批义项单一、内涵精准、外延明确的术语。1990年著者作《厘清概念》一文, 开端即明言: “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一, 是思维的模糊性, 由此带来的后果, 便是概念的不确定。……就当今中国学术而言, 由于传统的模糊思维的惯性作用, 又加之翻译外来术语与本土词汇接轨欠准, 导致滥用概念现象的新发展。现在已经到了必须专门提出, 力加救正的地步。”(收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之《月华集》)据此以观冯著, 则其将重心放在新语之辨析、概念之厘定上, 在入手处即获得了不同凡俗的创新价值。下面, 试就冯著的有关内容和特点稍加论列, 看其新意之所在。

(一)对关键新词深挖细探,辨误析疑,在有关概念的发现和厘定上深造自得,独辟新境

第二章第三节论利玛窦翻译西洋术语时,著者首先列举“脑囊”一例以明其首创之功。所谓“脑囊”在利氏《记法·原本篇》中仅寥寥数语,此前科技史论著稍有提及,而未作深探。鉴于利氏之说是以国人以心为思维、记忆器官之传统误解的最早纠正,冯著遂以慧眼将其重点拈出,浓墨重染,指出此词之创制“具有特别价值”。在进行了一系列纵横论说、开列了直至清末国人仍为思维器官究竟在脑还是在心争论不休的实况之后,著者指出:近人严复曾创造“脑学”一词,以作为表达人意识活动的专名,但因“心”主思维已约定俗成,故“脑学”这一含义准确的词语未获通用,反倒是后起的“心理学”得以大行其道。由此,既见出传统之顽强,更见出利玛窦早在300年前的“脑主意识”之论在中国的先进性。继“脑囊”之后,冯著还抉发利玛窦在地理学专名厘定方面的贡献:证明“契丹”即中国,“汗八里”即北京。此点前人从地理学上已有指论,而冯著则突出晚明传教士在新语创制上的贡献。同此,著者对“上帝”、“几何”等语在明末清初的传行脉络,也有精要勾勒。

关于“科学”一词的考辨,是冯著的另一创新亮点。第四章第二节论述日源汉字新语厘定时指出:中国许多论及外来语的辞书和著作,都把“科学”列入日本新创汉字词,这是不对的,因为“科学”在中国古典里早有先例,南宋陈亮、叶适已经使用,其义指科举之学;日本启蒙学者西周所做工作只是借汉语字形引申其义,赋予此词“一科一学”的意义,以对译西洋概念。与之近似的意义,在明末西洋科技传入时是以“格致”一词来充当的,所谓“格致学”至清末已得到相当广泛的运用。只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叶,随着日本科学书刊大举入华,“格致”逐渐被取代,“科学”一词才普及开来。这样,冯著便通过对“科学”一词的详细辨析,纠正了今人视之为日源新语的误识,说明了“科学”之古语、新语间的意义因革,描述了围绕此一词语所展示的极其复杂曲折的国人认识历程,从而使“科学”这一词语、概念的阐释圆满周详,题无剩义。与此相关,冯著还对清民之际从日本入华的其它一些汉字新语加以辨析,指出这些词也是此前从中国出口到日本的汉译西书拟订的,但直到20世纪晚期,中国出版的多种《外来语词典》仍把它们视作“日源外来词”,这显然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和处置上的失当。

(二)深入相关学科,将概念解析与社会文化态势及传播主潮相结合,由小见大,以点带面,开掘词语的文化内蕴和意义功能

不同于某些就词论词的释词法,冯著在解析词语、厘定概念时既用力于词汇学的深挖细探,又时时超越此一层面,从政治、文化、时势、心态等方面对有关词语的嬗变及意义生成作更为深入的阐释。在第六章的汉字新语个案考索中,著者共拈举了“革命”、“共和”、“自由”、“社会”、“文化”、“经济”、“封建”、“形而上学”、“小说”等十数新语,逐一辨析,异彩纷呈。著者或以深心大力探查其原始义,或联系欧西诸国及日本之历史状况考订其外来义,或将学术著作的教化之效与革命党人的实践活动相结合以论证其在现实层面的落实和衍变,或于无疑处生疑,以细密考订力破成见,申发新解。总之,灵活驾驭各种史料,自由穿梭于中、西、日历史文化的烟云之中,既述古今演绎,又论中西对接,其所展现的宏阔场景及原因揭示赋予这些词语以极为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已远非一般语言学、词汇学的研究所能包容。如果说,“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陈寅恪语),那么,冯著对上述关键词的辨析、解读和阐释,无疑即属于这种“文化史”较具典范性的例证。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举例详述。

(三)重视新语构成规律的探索和总结,将关注目标定格在历史和现实的坐标之上,体现出建设性的文化关怀

新名词的产生,无非四途:吸收方言词、复活旧词、遵循造词法创制新词、译介外来词。而译介外来词又可细分为音译、意译、音意合璧译,有双重借用、保留原义、引申新义、借形变义等多种方法。对这些方法,著者均逐一论述,对其优劣得失,时而击节称赏,时而扼腕长叹,而更多情况下则表现为对诸多误译的指正和针砭。典型者如“经济”与“形而上学”二词,其新义与古典义均相去甚远,无法从词形导出该新义,因而不算成功的译词。至于“封建”一词,在意义传递过程中发生的偏误更为突出:“封建”的本义是指封土建国,这是秦汉实行郡县制以前商周诸朝的主要政治制度,日本在12—19世纪建立了由世袭

军事贵族分享权力的封建制度,这既与中国上古之封建制美国,亦与9—15世纪的西欧封建制都具相近性,故在明治维新时期译介西洋历史学论著时,便借用“封建”来对译欧洲中世纪 Feudalism 这样一种社会形态。由此而言,这一译名是准确的。然而,当它传入中国之后,却在一种特殊的历史氛围里走进了意义误区。其一,20世纪20—30年代之际,“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一派仿效欧洲历史分期模式,将本是郡县制占主导地位的中国秦汉至明清这一长时段一概称之为“封建社会”;其二,40年代以降,史学界套用《联共(布)党史》划分的五种社会形态,进一步将秦汉至明清坐实为“封建社会”,并使之成为此后半个世纪的定论。这样一来,所谓“封建”便发生了意义混淆:既不符合此一词语的古义,也与此一词语的世界通用义相悖;既有碍于阅读古籍、理解古事,也给国际学术交流带来不便,以致在大陆学者同海外学者对话或互阅文章时,常为对“封建”概念全然不同的理解而徒生误会。

通过以上关键词语的辨析,著者深感“术语内涵之异,将导致整个论述的歧途发展”,所以,力倡在概念使用上谋求共识,以古义为基点,又与国际通义接轨,起码要顾及两者中的一个方面。只有辨清这些早已约定俗成之话语的偏差和问题所在,考察隐藏其背后的历史、社会及文化原因,才有助于我们和后人亡羊补牢,找寻固有误植译名的修正办法,并为日后更准确地使用概念,审慎地创制新语奠定基础。由此看来,著者做的虽是非常具体、细微的词语考索和概念厘定,而其关注点却指向了宏阔的更具建设性的现实和未来,他是在为当今和日后的词语译介和使用总结经验教训,以使新语生成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在一种宏通的视野中关合起来。而就治学方法言,这又是微观与宏观的结合,实证与理论的融通。套用清代桐城派古文家所谓考据、义理、辞章三者“相济”的说法,冯著在语义学层面的考索是为考据,在历史学、文化学层面的观照是为义理,而其行文的明快畅达、曲尽其微是为辞章。著者所要追求的,是借考据以阐发思想,借思想以引领考据,在考据与思想的结合部,展开一种广阔生动、富于激情而又有着明确现实指向的概念辨析和论理研究。在这一意义上,冯著才越发展示出其独特的学术品格。

(责任编辑 桂 莉)

## Conception-analysis and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 Based on Textual Research and Thought

SHANG Yong-lia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SHANG Yong-liang (1956-), male, Professor,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literature of ancient China.

**Abstract:** The *Origins of New Words and Phrase* by Professor Feng, which characterizes with the clarity of conceptions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has many creative views. Firstly, he deeply studies the derivation of important terminologies and find some new meanings. Secondly, going deep into correlative subject, he successfully combines conception-analyze and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al current. In this way, he unearthes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terminologies. At last, he focused 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terminologies. His research embodies constructive concern.

**Key words:** the *Origins of New Words and Phrase*; conception-analyze; textual research